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研讨

赵 顺 兰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赵顺兰(1975-),女,湖北黄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前沿问题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375-05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为了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了两次深入的研讨,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当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背景和意义

汪信砚教授认为,近年来,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传统教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体系所作的教条式理解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至90年代末,人们为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在需要,其方法论就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焦点问题。其次,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俱进的需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主要是通过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现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处理这种关系的方式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继续葆有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地位,我们能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前进,关键是要透辟地研究这些新问题,以及要俱有与这些新问题相适应的新的研究方法。再次,它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何萍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在于人们已经不满意传统哲学体系。传统哲学体系是前苏联模式的产物,中国当初之所以选择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未选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两国有共同的落后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国情,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现在之所以不断地反思原有体系,实质原因是我们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实践的重大变革。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的冲击,时代的变化要求哲学必须发展,必须借鉴新的资源,向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借鉴新的资源。

朱传荣教授说:对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都是由新的理论研究任务决定的;新的理论研究任务,又是由社会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提出来的。我们现在面临的研究任务同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的情况类似,首先遇到了方法论问题。当时摆在马克思面前的有两种方法: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是完全不能借用的。另一种是富有历史感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但在其现有形式上不能运用,必须进行改造。而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面临着传统的方法已不适用。有人提出运用“纯学理”、“真正哲学的方法”去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不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原理,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误导致脱离了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化、烦琐化和隐喻化。这是错误的。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在改造已有的方法基础上,创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要求的新方法。

姜锡润副教授认为,研究方法是主体变换客体信息的规则、途径、程序和方式,是对如何有效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比较稳定的回答,是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途径和桥梁。研究方法是否正确、有效、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提问和解题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认识的广度、深度、精度和效率。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博士生赵士发认为,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一是尚未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教条束缚;二是随意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的失误,因此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命运,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规定性

汪信砚教授认为,与任何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特有规定性,是由其理论本质决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学术界以往的许多提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特点乃在于其理想性;从理论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想的唯物主义。关于这一点,只能概略地说,马克思是一位西方传统中的思想家,他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中继承了三种思想,即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克思成功地实现了这三种思想传统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在研究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一种经过严密论证的理想的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性和规范性。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性和规范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基本的规定性。除此之外,由这种超越性、批判性和规范性决定并为其服务的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以及人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些重要的规定性。

何萍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妨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观念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并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破除的思维框架,同时,也是我们评价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标准,凡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就被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标准下,被裁决为非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史叙述方法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另一种特殊形态。我们不应该固守某一哲学体系,和用这种体系去评判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合理性,而应以时代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起点。

朱传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理性的唯物主义。从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评述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开始,到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思想进程看,他都是着眼于现实,从现实的发展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它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规定性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即它不仅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因而其方法的规定性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其方法论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就是运用其方法论原则的起始。

姜锡润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应该是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所谓的社会结构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人是社会结构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指向,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归宿。与人本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解放不是观念的解放,而是现实的解放,不是少数人的解放,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解放,并且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追求人的解放是人的实践的内在动力,人的社会实践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是人的解放的社会基础,在合目的和合规律的实践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实现人的思想解放和现实解放。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它要求:以人的解放为向度,考察当代人的解放所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由此得出具有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规范,为人的解放指明前进的方向。解题要坚持人道和科学相统一的原则、人本与唯物相结合的原则、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原则。

博士生胡红生则从哲学与逻辑的共通层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思维方法,认为逻辑学即辩证法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发生偏差和误解,实践中出现曲折和失败,都是没有把握马克思的逻辑学所致。如果说回到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留下什么最基本的“遗传性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恢复马克思的原有精神实质,不是重复马克思的某些观点,而是要深究马克思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他的理论学说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学会并习惯性的运用它。

博士生孙德忠认为,方法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一般将其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而哲学方法被认为是抽象程度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方法。与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比,哲学方法主要是它的反思性、理解性、体验性、领悟性。它要达到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和超越,因而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所无法满足和达到的。

博士生赵士发认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我延伸,即它对群众的把握与对当代实践的把握。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统一的。方法论不同于方法,是对方法的反思,它贯穿于人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具体表现在理论的提问方式、表达方式、理性工具与理论旨归上。具体而言,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问方式上要求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角度提出问题;在表达方式上要求用对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开放的话语系统去表达观点;在理性工具方面要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思维方式;在理论旨归上要求始终坚持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谋福利的目标。只有将以上这些方面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生商卫星认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我们的研究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而在思辨的天空里构造体系,而要以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的动因和出发点,以解决困扰社会生活重大理论问题为目的和归宿。

博士生郭剑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决定了研究的方法,而对象和问题是随着历史时代和历史事实的变化而改变的。从这个角度看,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因素有二: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对象和基本问题;其次是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在国内国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中,出现的新事实和新问题。尤其是实践上提出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同科学进步提出的问题和对象一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

博士生李庆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决定于它把握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因此我们应当密切注视当代社会生活实践,重视思考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给我们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方法论上来讲就是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在解决时代性课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唯物与辩证、科学与人道的时代水平的统一。

三、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特点、内容及其存在的问题

汪信砚教授认为,从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人们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原则,二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相比较而言,人们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探讨显得更充分一些。针对以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人们纷纷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方法论原则,如强化民族意识与强化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相统一的原则、“返本”与“开新”相统一的原则、个性化原则,等等。在第二个层面上,人们也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若干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未曾受到重视、或重视得不够的方法,如反思的方法、文本考证的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等等。所有这些探讨,对于在新的世纪促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觉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类研究和探讨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某些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令人有捉摸不定,象似仅仅扯起了一面大旗,并未有作具体的提示。第二,某些已提出的很有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却并没有获得认同,反而还受到了某些误解和曲解。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人们对于“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态度上。第三,某些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缺乏具体方法层面的支撑,不具有可操作性、很难对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影响。

陈祖华教授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及哲学思维方式的误用问题,表现在以科学的任务取代哲学的任务,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取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以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实证化、庸俗化的倾向。因此,正确区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哲学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研究中,自觉坚持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反思的基本内涵,主

要功能等问题,黑格尔作过比较集中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既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延续,更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伸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建立了实践与科学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精神。其次是依据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读、传播以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清理。再次,是展开了同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对话(当然还很不够),并开始不同程度地吸取其优秀成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运用反思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实践与科学的综合形式,是开放的理论体系,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努力实现对实践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跨度与深层次综合,必须努力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综合;第三,在实践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同时要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同层面与实践连接方式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随着实践与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也必须随着实践与科学的发展而采取新的形式或新的形态,但也不能轻易地依据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体变化或某些经验事实,一下子提高为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规律,并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四、当前和今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

汪信砚教授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要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规定性。诚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和方法论的基本规定性,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但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进行相应的方法论建设。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进行所谓的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二,对于既已提出的一些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研究方法,应该加以必要的清理和阐发。一方面,要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兼容互补;另一方面,也要考察其中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独具的,它们何以能够担负起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深入的重任。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应同时在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两个层面上展开。当前,我们特别要注意加强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需要,吸收、借鉴和改造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如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语言分析方法,等等。

赵凯荣教授认为,国内外研究表明,教条化、庸俗化、简单化是 20 世纪以来阻碍人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因素。因此,作为发展的哲学,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在反教条化、反庸俗化、反简单化的过程中走过来的。这一复杂性转向是目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前沿也是最重要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性转向应坚持四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一是要充分注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性转向与其它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性转向的互动,特别是对其它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简单性问题的批评予以严肃的注意;二是要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性转向与当代时代复杂性问题的互动。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真正的哲学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转向。特别是生态化和全球化诸问题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向复杂化;三是要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性转向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互动。一方面,如普利高津所言:“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都有类似的说法),拉兹洛甚至直言,当代许多复杂性哲学的成果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某些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将复杂性科学的许多非线性的辩证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四是要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性转向与马克思的复杂性哲学思想的互动。一方面,随着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马克思的许多复杂性哲学思想被发掘出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马克思”在这种意义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性转向,马克思的哲学也必须根据新情况复杂化,这又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出马克思”。

复杂性转向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对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于注重自然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性质这一简单化倾向有重大意义。因为复杂性从根本上拒斥还原论;其次它对克服以往局限于坚持与发展的矛盾而引发的关于谁真正代表或谁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简单性有重大意义。根据复杂性的演化,任何理论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并且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组织的复杂性演化过程,它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又有复杂的分叉结构。正如从简单到复杂一样,这种发展也具有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走向。最后它使许多复杂的辩证性得以说明,使辩证法与诡辩论真正区别开来。同时,它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可能真正走出狭隘的规律观。并且,由于引入了内随机性、混沌性、初始条件敏感性等,大大深化了对规律性的理解。这种复杂性研究既加强了理论涵盖的信息复杂性,又使这种复杂性真正成为了可以理解的复杂性。而不是那种玄虚的、空洞无物的复杂性。如黑格尔和列宁对“相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的批评。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哲学的发展应该是向着历史深度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人误认为只有讲马克

思没有讲过的东西才算发展,这是一种按照时间的先后和质料的新旧来理解的直线式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积极意义是可以解放思想,因为它允许人们讲马克思所没有讲过的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1)只要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东西,随便什么想当然胡编乱造的、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东西,都扯到马克思头上,说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2)谁垄断了话语权,谁就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别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3)既然是讲马克思没有讲过的东西,就可以放言高论,不必考虑马克思原来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反正马克思也不会站出来说话;这样不仅讲起来容易,听起来也新鲜。其实,真正的发展意味着要超过马克思原有的水平,这样就必须首先达到马克思原有的水平。正如向前发展不能理解成越新越好,回到源头也不能从外在时间上理解成回到过去的某个地方、某个时候,而是指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初视域中,这原初视域其实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哲学只能是以回到源头的方式、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哲学都是以回到源头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如黑格尔对古希腊哲学的回复,海德格尔回到前苏格拉底的思想,每一步发展都追溯到更远的源头,而不是远离源头。

向历史深度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整体论的历史观作基础。我们的理性能力足够我们这样去想问题:全部历史运动过程从总体上看又是一个单纯的静止。尽管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但总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和谈话方式始终保留下来了。因此今人可以同古人进行超时空的对话(神交)。参与对话和交往者,等于他个人在思想上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重新经历一遍。于是他便发现历史不光有长度,而且还有深度。那些优秀的头脑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被保持下来,代表着历史的深度。这个历史的深度就是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起点。哲学发展尤其要以这种深度历史观作基础。哲学的发展不能像自然科学进步那样表现为知识的积累和增长,因而也不可能日新月异。对一种原创性哲学思想的理解永远不会有到顶的时候。深入理解一个东西,和向前发展一个东西,是很难分开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理解之上,理解中即已包含着发展。真正的哲学发展需要我们把深入理解原意和向前发展新说看做是同一过程。

博士生孙德忠认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建设应面向“马克思本身”和面向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的历史为我们当前的继续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材料,这些构成了我们当代思考的理解前结构。但这种理解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甚至存在不少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乃至曲解。从哲学诠释角度来看,我们应当立足当下的现实背景,用我们当代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去激活马克思思想宝库中的已有思想资源,实现我们的当下视域和马克思文本视域在更新了的时代发展水平上的新的视域融合,在返本与开新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另一方面,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主题由革命和战争转向了和平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向马克思本身”的同时又要“面向哲学自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量从各种非哲学因素的纠缠中剥离出来,尊重、遵循哲学自身的逻辑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起点和方法、立场和根基、视域和理想。马克思本人事实上已为我们规定了其哲学理性的实践根基和现实生活世界。

博士生赵顺兰认为,当前和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建设主要应实现以下三方面的统一:首先是实现世界意识、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自觉地关注和深刻地反思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努力捍卫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其次是实现“返本”与“开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必须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现当代西方哲学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借鉴资源,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人类实践和科学的最新成果,明察时代精神的动向,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后是实现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的统一。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性规定之一,它包含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着力于实现二者的统一。哲学无疑是一种终极关怀,但这种终极关怀必须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即要对现实生活中凸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给予一定的哲学阐释,并通过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加深对时代精神和生活意义的把握,帮助人们确立健康向上的理想、信念、价值导向和伦理观念,在全社会塑造出一种崭新风貌与人文精神。

注 释:

- ① 参加本次研讨的有:朱传荣教授、陈祖华教授、汪信砚教授、何萍教授、赵凯荣教授、姜锡润副教授、萧诗美副教授、博士生郭继海、胡红生、孙德忠、赵士发、杨鲜兰、曾庆发、凌新、商卫星、夏昌奇、郭剑仁、李庆云、赵顺兰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